

政治学手册精选

下卷

〔美〕格林斯坦 编
波尔斯比

商 务 印 书 馆

政治学手册精选

下 卷

〔美〕格林斯坦 波尔斯比 编

储复耘 译

王沪宁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年·北京

HAND 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itor-in-Chief

Fred I. Greenstein

Nelson W. Polsby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根据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 1975 年版选译

ZHENGZHIXUE SHOUCE JINGXUAN

政治学手册精选

(下 卷)

[美] 格林斯坦 编
波尔斯比

储复耘 译

王沪宁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686-X/D·131

1996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71 千

印数 3 500 册

印张 15 1/2

定价: 20.50 元

目 录

八	政治社会化	戴维·O.西尔斯	1
	1. 对政治体系的依附		5
	2. 派性倾向在成年期前的发展		34
	3. 成年期前政治社会化遗迹的持续性		46
	4. 结束时的评语		58
九	组织理论与政治学	丹尼斯·J.帕隆博	83
	1. 导言		83
	2. 组织行为的政治模型与理性选择模型的对比		86
	3. 理性作为实现目标的过程而非成就		92
	4. 收入分配效应和成本-收益分析		95
	5. 全知理性的种种局限		98
	6. 决策理论与不确定性		103
	7. 理性选择理论的含义		118
	8. 决策的构造		123
	9. 组织理论中的权力		126
	10. 组织的集权与分权		130
	11. 决策中的事实与价值		133
	12. 结论		136
十	政治发展	塞缪尔·P.亨廷顿 乔治·I.多明格斯	148
	1. 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		148
	2. 什么影响着政治发展		160
	3. 政治文化		166

4. 政治参与·····	188
5. 政治机构·····	205
6. 政治一体化·····	228
7. 政治发展的未来·····	258
十一 政治参与·····诺曼·H. 尼 西德尼·伏巴	290
1. 政治参与是什么? ·····	290
2. 参与为什么是重要的? ·····	293
3. 政治参与研究·····	295
4. 参与的各个向度和模式·····	297
5. 公民活动的程度如何? ·····	315
6. 政治化的进程·····	325
7. 谁参与? ·····	334
8. 政治活动的结果·····	361
9. 政治活动的理性·····	371
十二 国际关系理论·····肯尼思·N. 沃尔兹	380
1. 法则和理论·····	381
2. 归纳主义理论: 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的解释·····	399
3. 现实政治与均势理论·····	422
4. 解释国际结果的系统方法·····	435
5. 结论·····	464

八 政治社会化

戴维·O.西尔斯

个人的行为举止通常都被分析为历史的与同时代的影响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研究政治社会化的意图是探讨历史对成年人政治态度和行为举止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历史至少是指个人生命期间所发生以及与其生命空间有某种紧密联系的那部分历史。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有关政治社会化的知识的当前状况。我的意图除了提供入门参考资料以外，还想帮助专业读者或学者了解这个杂乱的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但是，在开始时必须坦率地说明，“知识的当前状况”并不总是考虑非常肯定的结论的。因此，我在许多地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阐明各种相关的理论假设上，以便提供我能得到的一切材料，尽管材料往往十分短缺。我希望这种做法会有助于明确那些尚存的关键经验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希望本章既是一份现状报告，又是进一步研究的前奏曲。

因此，本章的主要着重点将放在“政治社会化”领域所包括的若干方面的实质性理论和研究的状况上，而不是放在对这整个领域的某种批判性的一般观察上。然而，为了明确起见，我首先要对这一领域所涉及的问题作些简要的说明，如它的历史、它所涉及的政治内容、各相关理论以及它所遇到的一般性问题（对这最后一点的详尽估价将放在本章结束时来作，这样就可以根据这一领域的实际发展来加以探讨）。

当然，从柏拉图经过卢梭到毛（泽东）的几乎每个时代，在政治

理论上都预料到政治社会化这一领域。它的当前化身主要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对公民教育的研究（参见梅里亚姆，1931年；威尔逊，1938年）。然而，它却迟迟未被写进以经验为研究方向的政治行为文献中，例如，《社会心理学手册》所刊载的有关1954年投票的文献的主要摘要（利普塞特以及其他等等，1954年，第1143—1150页）几乎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但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研究突然开始蓬勃发展，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应归功于海曼的评论文章（1959年）以及弗雷德·格林斯坦（1960年，1965年）、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赫斯（赫斯与伊斯顿，1960年；赫斯与托尼，1967年；伊斯顿与丹尼斯，1969年）对儿童态度所进行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开拓性研究。到60年代中期，研究势头发展得如此迅猛，以致《社会心理学手册》1969年版论政治行为的评论文章竟以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政治社会化问题（西尔斯，1969年a，第370—399页、414—419页、438—443页）。自那时以后，研究成果以几何级数速度增加，最近已出版了若干读本和文选（阿德勒与哈里森，1970年；布洛克与罗杰斯，1972年；道森与普鲁伊特，1969年；丹尼斯，1973年；格林伯格，1970年a；贾罗斯，1973年；里卡兹，1973年；西格尔，1970年；韦斯伯格，1974年）。本文的文献目录就是一个证明，说明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可谓形形色色。（科本，1970年和丹尼斯，1973年还出版了有用的历史与书目）。

调查研究得最为经常的政治社会化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1）对政治体系的依附，（2）党派性态度，（3）政治参与。按照通常的定义，依附着重政治体系或“政权”的组织机构、结构和规范；党派性着重现任的“当局以及争夺权力和影响的其他个人、集团、政策态度和意识形态（伊斯顿，1965年）。依附与党派性之间的区别虽然从直觉上讲乍一看清清楚楚，令人愉快，但从经验角度讲原

来却是模模糊糊，令人生厌。这一点，以后将会清楚地反映出来。不过，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是相互独立地开展的，因此这里也就很自然地将分成两节加以讨论。

第三个内容——政治参与，由于种种原因将不在这里讨论。依附和党派性主要涉及态度，而参与则在更大程度上涉及公开的行为，因此就难以把任何非常统一的理论结构套用在这两组现象上。特别是，它们的发展可能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同生命循环发生联系（参阅 J. D. 巴伯，1968 年；詹宁斯和尼米，1968 年 b）。那些对参与更感兴趣的人，应该参考本下卷伏巴与尼所写的那章（第 11 章）。

“政治社会化”的定义五花八门，不过归结起来主要是两种。最常规的定义意味着社会按某种先验的模型塑造儿童，通常是指能使现状永存的模型，诸如“灌输”、“文化传入”、“教化”、“文化传递”和“采纳文化规范”等词，是常用的同义词。兰顿曾经这样说过（1969 年，第 4 页）：“从最广义上讲，政治社会化指的是社会把它的政治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方式。”往往被忽视的另一种定义强调儿童特有的个性发展，成长中的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他自己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允许他表露自己的观点并谋求按照自己的方式满足他自己特有的需要和价值。上述两种观点都不是研究儿童的政治倾向，或者他们如何通过生活来改变自己这一工作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也不是其结果。研究政治社会化不一定是研究一致点和现状的维持，尽管有些评论家有这种看法。

正如伊斯顿和丹尼斯（1969 年）所说的那样，政治社会化理论通常不是采取“心理学”形式，就是采取“政治”形式。“心理学”理论把个人倾向（例如，儿童的政治态度、政治卷入的水平等等）当作兴趣的输出变量；而“政治”理论则把这类倾向当作仅仅是通向涉及政治体系的某些方面（如它的持久性）或政治政策的关键输出变

量的桥梁。

换一种说法,对政治学家来说,研究政治社会化的最基本理由是,早期获取的态度最终会在政治体系中产生某种结果。心理学家当然对发展进程本身有着更为内在的兴趣,这一情况可能引起一些颇令人迷惑不解的对话;而政治学家念念不忘的政治内容(例如党派认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似乎可能是表面肤浅的,因此,对注重发展的心理学家来说,是令人生厌的。另一方面讲,与成人政治行为无任何十分明显的关系的奥秘的心理学理论(例如皮亚杰的理论)对政治科学家来说似乎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参阅格林斯坦,1970年)。本文对心理学理论将不作详尽的探讨。

被认为会出现政治发展的年龄段,最近几年发生了剧变。今天已出现了把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同对处于成年期前,甚至青春期前的人的政治行为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倾向。这当然是早先的一种观念的反作用,这种观念认为,公民在到达选举年龄时才算成熟,因为儿童无政治思想。确实,对政治依附所进行的最有趣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青春期前儿童的研究上,虽然近来青少年一直是大家严重关切的问题。至于党派性,显然,发展在分散于整个生命过程的各个关键时刻,可能会采取十分不同的形式。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能详细论述在生命后期所发生的各种发展,虽然早期社会化遗迹的持续性是个重要问题(本文结束时将论述这一点)。^①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在将来都会成为研究的重点,故我在另一本书(西尔斯,1975年)中广泛地探讨了这两个问题。

任何吸引了如此众多的研究活动的领域,很快也会吸引那些认为部分或全部努力均被引入歧途的人们。当然有些评论家是建设性的评论家,但另一些不过是些贬损者和诽谤者。关于对这整个领域的更有创见的评估,请参见丹尼斯(1968年、1973年)、格林斯坦(1970年)、卡瓦纳(1972年)、科本(1970年)、马什(1971年、

1972年)、西林、施瓦茨和林德(1973年)以及韦斯伯格(1974年)。迄今提出的较为明确的批评,主要涉及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方法论普遍不适当、政治上离题、保守偏见以及早期社会化遗迹缺乏持久性。如上所述,本文重点为这一领域的具体发现,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加以评论。我将在本章结束时再回过头来论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进行的研究中已非常恰当地讨论过了。最先的三条批评意见虽然这里并未予以详细研究,在我看来似乎不会坚持下去;重要和有趣的问题显然正在调查研究之中;目前的方法似乎不是完全误入歧途和引入歧途,而是不完善,而近年来对向体系挑战的倾向和维护体系的倾向,都已经进行了调查。最后那个有关早期社会化遗迹的持续性的批评,的确引起了一些有趣和迄今尚未解决的经验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在结束时予以阐述。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依附问题。

1. 对政治体系的依附

对于儿童早期对政治体系的象征的依附已予以很多的注意,这部分是因为这种依附被认为(对成年人政治合法感的发展)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另一部分是因为这是儿童对政治舞台似乎要作出的最早一种感情反应。至于人们如何精确地给依附下定义,并把它同更带有党派性的态度区分开来,这似乎并不像乍看时那么简单。在回顾对依附所作的经验研究以后,我们将比较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通常纳入依附这项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政权象征(国旗、公共建筑物、历史文献、标语、光荣的民族英雄和事件)的情感、广义的政治信任、对机构的支持、对公共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的支持和在行为上对政策的依从以及对政治游戏支配规则的赞同。

童年期社会化：初期的观点

弗雷德·格林斯坦、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赫斯以及他们的同事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收集的早期材料，提供了一套以后一切工作必须以此进行估价的水准基点。他们的结论强调幼童对政府的拟人化和理想化观点，强调他们对政治体系积极的感情依附。然而，总的来看，这个材料存在着严重的潜在局限性，因为收集的材料主要取自白肤色的、中产阶级、市区和近郊的美国儿童，而且只是在一个历史时期。首先，让我们略微回顾一下那个早期研究所概述的观点（更详细的材料，请参见伊斯顿和丹尼斯，1969年；格林斯坦，1965年；赫斯和托尼，1967年或西尔斯的摘要，1969年a），然后再讨论后来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民族和文化背景下所作的工作对此研究的评价。

单纯的沙文主义 国家或政治体系的最早的概念，似乎由儿童对他自己的国籍的概念组成。6岁儿童在被调查的各种国家里，认为其他国籍的团体与自己不一样，而自己的同胞则一样（兰伯特与克兰伯格，1967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自己国家的各种象征就有了强烈的积极感情，虽然那时理性内容还比较模糊。美国的小学生对美国国旗、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美国人民有着强烈的积极感情（赫斯与托尼，1967年；劳森，1963年）。这种早期依附通常的理性化（例如，美国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的自由或民主）只是到后来在儿童进入少年期时才会出现。

拟人化和理想化 儿童最初通过熟悉政府最突出的领导人来接触政府。例如，格林斯坦（1960年、1965年）发现，四年级学生中有96%知道总统的名字，而对政府其它方面的熟悉程度就差远了。因此，儿童把政府拟人化了，认为它完全是由伟大的领导人组成的，而不是由机构、主角、法律或建筑物组成的。例如，伊斯顿和丹尼斯（1965年）发现，二年级学生在被要求挑出“两张最好的政府

照片”时，倾向于挑选乔治·华盛顿和肯尼迪总统(86%)。同样，他们挑出，作为“管理国家”(也是86%(和制定法律(76%)的总统。伊斯顿和丹尼斯(1969年)还断定，幼童认为，警察也是政府的化身，提出了同调查者所说的政府的“正面和反面”早期接触的模式。

幼童还倾向于把“总统”理想化。二年级学生把总统同“父亲”并列，接近于“我最喜爱的人”。75%的学生认为，“如果你写信给总统，他对你想的事情会十分关心”，同样比例的学生认为，“我如果需要帮助，他总是会帮助我的”(赫斯和托尼，1967年)。四年级至八年级学生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评价在50年代末是如此之高，以致格林斯坦(1960年)把他描绘成他们心目中的“乐善好施的领袖”。

幼童对其他权威人物就不那么理想化了，虽然他们对所熟悉的各个权威和机构一般都持友好态度。例如，72%的四年级学生说政府“差不多从不”或“很少”犯错误，而不说“有时”、“常常”、“通常”或者“差不多总是”犯错误(伊斯顿和丹尼斯，1965年)。他们同样也赞同最高法院、政治家、政治候选人和警察。那时，成年人对总统也持肯定态度，但不过分(格林斯坦，1965年)。但是，根据这些早期的研究材料，最被理想化的是幼童心目中的总统形象，他是政府的化身。

儿童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总统的理想化程度减弱了。他们越来越不单纯从拟人化的角度，而是更广泛地从机构、法律、角色和其他权威的角度来理解政府。根据伊斯顿和赫斯的研究，八年级学生把政府拟人化的要少得多；只有25%的学生把华盛顿总统和肯尼迪总统说成是象征政府；只有58%的学生认为总统管理国家；只有5%的学生认为他制定法律(赫斯和托尼，1967年)。年龄较大的儿童日益把诸如国会这样的机构看作体系的中心；他们有关其他政治人物和团体的知识显著增加(格林斯坦，1965年)。另

外,对体系其他权威的赞同程度,也提高了。

因此,早期的研究发现,青春期前儿童对总统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知名人士;他们倾向于把总统看作政府的化身并把他理想化。随着儿童进入青春期,他们变得较多地了解政府的其他成份,开始越来越从集团和机构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而不是单纯强调个人,对总统也不那么理想化了,虽然一般来说仍然是赞同他们所熟悉的其他机构。

这一格局包含两个一般含义。一个含义是心理学方面的:儿童的拟人化和理想化起因于他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心理动力需要(格林斯坦,1965年;赫斯和托尼,1967年)。另一个含义是政治方面的:这种早期的拟人化和理想化被解释为儿童忠于政治体系及成年后对政治权威具有合法感的必要先决条件,而后者最终将被看作政治体系得以坚持下去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伊斯顿和丹尼斯,1969年)。

后来的批评

这种早期研究以后,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了范围要广泛得多的儿童和政治体系。调查研究人员发现了关于儿童态度的颇为不同的情况。他们发现,儿童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把当局拟人化和理想化。他们怀疑,这种早期社会化对后来的支持体系观念究竟重要到何种程度。让我们对这些问题逐个进行探讨。

不知名的推动者 儿童把“政府”拟人化为总统(或其他国家元首)的观念,意味着占有这一角色的人具有某种特殊的可见性。总统被认为凌驾于儿童的生命空间之上,就像古时候对上帝必然会有想法一样。然而,证据却是:民主国家的首要政治领导人并不都具有这种特色。

在美国,总统通常是最有名的知名人物,不管是在儿童中间

还是成年人中间，情况确实都是这样（格林斯坦，1965年；西尔斯，1969年^a）。根据1969至1970年对13岁儿童所作的一次调查，94%的儿童能认出总统；60%的儿童能认出副总统，但是只有16%或许更少一些，能认出他们的参议员、众议员、内阁官员或国会领导人（格林斯坦，1973年）。法国的戴高乐（罗伊格和比朗-格兰德，1968年）和英国女王（格林斯坦，1973年）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政治领袖并不是那么有名。在澳大利亚（康内尔，1971年）和加拿大（帕姆梅特，1971年），儿童对美国总统的熟悉程度超过他们对自己总理的了解。

认识也不是一概都拟人化的。不错，法国、英国和美国儿童的心目中，领袖人物（总理、总统）角色的形象比他们国家立法机构的领袖人物更有区别（格林斯坦，1973年）。但是在加拿大，儿童对议会的了解多于对总理的了解（帕姆梅特，1971年），在哥伦比亚，最年幼的儿童则认为，在行政管理方面，国会比总统处于更中心的地位；而最高法院则比总统更有权力（里丁，1968年）。

国家元首在儿童英雄群像中是否处于中心的统治地位呢？显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在好几次研究中，对儿童的榜样（“你最喜欢像谁？”）曾作过调查。格林斯坦在1958年发现，只有3%的儿童提到总统，另有7%援引了华盛顿或林肯（1965年）。在英国，1969年17%的女孩提到女王或王室的其他某个人，只有2%提到在任的某个政治人物；而男孩子分别是8%和7%（斯特拉德林，1971年）。这两项研究也回顾了在本世纪初所作的效果十分惊人的相同调查。1964年，法国儿童在提到那些为法国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物时，几乎都未提及戴高乐，却有48%的儿童写了帕斯德的名字（罗伊格和比朗-格兰德，1968年）。这些当然不是国家元首处于绝对中心位置的事例。1967年，在被调查的德国中学生中，很少有人把当今的领导人看作是自己国家中最值得为之骄傲的人；有

22%的学生说，希特勒是他们最不为之感到骄傲的人(培克，1970年)。因此，一位国家领导人即便是中心人物，也可能不是一位英雄。

我们没有任何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儿童特别需要将一个有力的领导人强加在关于自己的政治体系的概念上。领导人的中心地位似乎是个时有时无的东西，取决于他在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和威望，而不是儿童的需要。不管怎样，在儿童的英雄群像中，他通常并不占有非常中心的位置。

狠毒的和/或易犯错误的领导人 儿童一般来说对国家元首也不是绝对理想化的。原先那个“乐善好施的领袖”是在艾森豪威尔任期末和约翰·肯尼迪任期之初那段时间，主要是在中产阶级白人儿童中发现的(格林斯坦，1960年、1965年；赫斯和伊斯顿，1960年；伊斯顿和丹尼斯，1965年)。现在，我们从广阔的历史时期(包括其他不那么有名望的总统)从更广泛的人口阶层及其他政治体系中得到了资料，它们提供了一幅颇为不同的图景。

后来的总统即便是在相同的年龄层(大体是从9岁至14岁左右)中也引不起这种理想化的看法。贾罗斯、赫希和弗莱朗(1968年)发现，1967年，在阿巴拉契亚一个共和党影响很强的地区，白人儿童对约翰逊总统的评价也不是十分肯定的，这些调查研究人员用了“狠毒的领导人”这样的字眼来描绘这些青少年的玩世不恭态度。1968年和1971年，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抽样调查的儿童，对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的评价至多只能说是不冷不热(见表1)。同样，维兰考特(1972年)发现，旧金山海湾地区儿童1968至1969年对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的评价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托利(1973年)调查了不同阶层的青春期前儿童，发现他们对尼克松总统处理越南问题的作法绝大多数持否定态度(第65页)，即便是那些被认为容易理想化的三年级学生，持肯定态度的也未大大超

表 1 青春期前儿童对著名政界人士的

估价 1968年和1971年(按百分比)

	抽样 调查	喜欢 (1)	不喜欢 (2)	不确定 无感觉 (3)	不认识 (4)	纯情感 (1-2)
殉难的领导人和家庭						
约翰·肯尼迪总统*	1968S1	95	1	2	1	+94
(遇刺后)						
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	1968S1	72	6	16	4	+66
(遇刺前)						
特德·肯尼迪参议员	1971F	60	7	12	21	+53
马丁·路德·金	1968S2	78	5	14	2	+73
(遇刺后)						
在职总统						
林登·约翰逊总统*	1968S1	46	23	25	5	+23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	1971F	31	39	6	24	-8
其他政治领导人						
罗纳德·里根州长*	1968S1	36	49	21	4	-23
罗纳德·里根	1971F	24	38	14	24	-14
理查德·尼克松	1968S1	22	20	31	29	+2
休伯特·汉弗莱副总统	1968S1	37	21	35	21	+29
埃德蒙·马斯基参议员	1971F	14	9	49	28	+5
少数民族领导人						
塞扎·查维斯	1971F	19	19	4	20	+5
安吉拉·戴维斯	1971F	18	20	39	23	-2
马丁·路德·金	1968S1	21	19	22	38	+2
(遇刺前)						

注: 1968年4月(S1)和6月(S2)对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公立学校学生进行了调查(1284人); 1971年2月(F)对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的公立学校学生进行了调查(946人)。学生的年龄从9岁至14岁。在萨克拉门托, 种族的比例为: 英裔占67%、黑人14%、墨西哥人11%; 在弗雷斯诺, 比例分别为41%、28%和25%。其他的儿童来自各种族集团。

*只有有此符号者写明了头衔; 无此符号者, 只提供姓名。

对持否定态度的(第69页)。他用了“容易犯错误的领导人”一词。②

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儿童时也未发现理想化处于压倒优势。罗

伊格和比隆-格兰德发现，法国儿童更有可能对那时的戴高乐总统持否定态度而不是肯定态度；斯特拉德林和朱里克(1971年)发现，英国学校的儿童很少有人把英国党派领导人理想化，而是有许多人对他们作了否定的评价。格林斯坦和泰罗(1970年)利用投影技术所作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在美国，对国家元首的评价肯定意见多少要多于否定意见，而在法国或英国，情况就不是这样。艾布拉姆森和英格尔哈特(1970年)报道了早期对英国和荷兰君主理想化的材料，但是对法国总统或这三个国家的总理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更说明问题的是这一发现：属于某些社会集团的儿童对总统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而不是什么早期理想化。根据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所作的抽样调查，青春期前黑人儿童和墨西哥儿童对尼克松总统持十分否定的态度，见表2。加查(1973年)、西卡(1972年)和托利(1973年，第72页)报告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任职期间，在总统对黑人的支持几乎达到空前程度的那些时期中所收集的材料表明，黑人幼童对总统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常常比那些白人儿童的态度还要肯定(贾罗斯，1967年；艾布拉姆森，1972年a，第1264页；西格尔，1965年、1968年)，不过情况到1968年已多少有些改变(格林斯坦，1970年d)。根据托利对有关越南的态度所作的研究，白人中等收入家庭的儿童(第82页)和军人家庭的儿童(第77页)对尼克松总统的态度比较高收入家庭和文职人员家庭的儿童远为肯定。

附带说明一点，早期所做的工作得出的某些看法认为，儿童早期对政治体系的依附也是由于他们把政府拟人化为警察并使之理想化而引起的(伊斯顿和丹尼斯，1969年)。但是近年来情况已变得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把警察理想化，超过他们对那些不受欢迎的总统的理想化。1969年，在罗彻斯特所作的调查发现，两